

「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原則之思考

◎ 郭培清

中非合作已進入歷史上罕見的蜜月期，令歐美國家和日印韓等國艷羨不已。在涉及中國對非政策上，無論是中國政界，還是媒體或者學界，無不反覆強調中國對非援助投資的「無附加」原則，即「不干涉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在這一原則指導下，中國政府尊重非洲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不參與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不尋求向非洲國家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毫無疑問，這種「無附加」原則在政治層面是十分有效的，在非洲民間也有相當程度的認可和讚賞，不少非洲政要稱讚中國是非洲「真正的朋友」。

深入思考這一原則，它同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中的「不爭而善勝」、「勝於無形」等戰略思想有暗合之妙，是春秋戰國時代外交智慧的發揚光大。西方國家從15世紀末起開始劫掠非洲，但歷經400多年血與火的征服，以及大棒加胡蘿蔔式的「綜合治理」，都無法贏得非洲的「民心」，最終不得不承認非洲政策的失敗，哀歎非洲是「沒有希望的大陸」；而中國只用了半個世紀就把非洲攬入懷中，這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外交的「無附加」原則，無為方能無不為；不爭者，天下莫能與之爭。該原則體現出的辯證戰略思維，與以征服自然和征服他者為追求的西方剛性戰略文化相比較，凸顯了中國戰略文化震爍古今的生命力。

但近年來，從東非國家肯雅到西非石油大國尼日利亞，再到中國工人4月份罹難的埃塞俄比亞，2007年以來針對中資機構人員接連不斷的襲擊和綁架，說明幾十年來中國人在當地的安全形勢從未如此嚴峻。這一狀況引發了人們對「無附加」原則的思考——中國依然可以對「不干涉」嗎？顯然，中國外交面臨著嶄新的考驗，現實提醒我們必須探索新的思維方式，以應對新挑戰。

一 干預的必要性分析

今天，中非關係之密切，以及對中國之重要盡人皆知。中非合作不單是經貿合作，而是涉及政治、文化等多領域的全方位合作。一言以蔽之，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已經同非洲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非洲已經距我們「很近」，發生在非洲任何一個角落的事情都可能與中國有關。2007年頭4個月裏非洲連續發生了五起襲擊中國工人的暴力活動，僅在尼日利亞就連續發生了三起襲擊中國工人的事件，前後共有16名石油和電信工人被綁架，而埃塞俄比亞的襲擊事件更導致9死1傷7綁架的慘劇。這一系列的暴力行為讓中國的非洲經濟活動付出了高昂的人力代價和政治成本。

就目前看，這些事件的起因，都不是專門指向中國，因為在這些地區從事經濟活動的任何外國人都是襲擊者的目標，義大利人、英國人等等早就「享受」到了這些「待遇」。襲擊中國

工人事件的發生主要源自非洲的政治動盪和社會治安的惡劣。上世紀70-80年代非洲的經濟長期停滯，冷戰結束後的90年代又經歷了「民主化」和「私有化」運動，種族部族衝突、邊界糾紛、宗教矛盾、黨派鬥爭、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得到了恣意釋放，經過十多年的震盪，雖然從2005年起非洲展現出全面發展的樂觀局面，大部分國家向好的方向轉化，但在個別國家和地區不利於穩定的因素並未消失。隨著中國在非洲利益的擴展，這些不穩定因素構成了對中國非洲戰略的嚴峻挑戰。

中國企業所處的一些非洲國家大多都政局不穩，社會動盪不安。很多政府跟反對派本來就有武裝衝突，中國在加大與各國政府合作的時候，往往忽視了有可能成為這些衝突的犧牲者。當地反政府組織在沒有力量抗衡政府的時候，往往就採取暴力手段，襲擊或者綁架人質向政府施壓。中國員工沒有受到充分的保護，很容易成為當地反政府組織襲擊的物件。昔日中國在這些國家沒有多少經貿和能源利益，所以完全可以保持超脫；但現在已日益變得不可能，傳統上那種認為「生意就是生意」，「努力把政治與生意分開」的思想已經滯後於快速發展的中非關係。愈演愈烈的襲擊事件完全顛覆了中方的一廂情願——中國已無法繼續置身事外，這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2007年4月中國石油設施被襲擊之後，埃塞俄比亞反政府武裝分子聲稱，他們之所以要發動襲擊，是因為中國與埃國政府聯手，在屬於他們的土地上「非法」開採石油。雖然中國政府歷來非常謹慎，力圖避免介入該國政府與反叛武裝之間的爭端，但結果還是變成了他們國內衝突的受害者。在非洲，此類非傳統威脅不只在一個國家存在。這就說明，非洲國家內部的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實施非洲戰略的重大障礙。如果旁觀事態繼續發展，最終受害的將是中國自身的利益。蘇丹達爾富爾衝突就是一個突出事例。

蘇丹是到目前中國在非洲石油投資力度最大的國家。2003年蘇丹西南部的達爾富爾地區因為當地阿拉伯人同黑人之間爭奪土地、水源等自然資源爆發了大規模衝突，已經導致20萬多人死亡，200多萬人淪為難民，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¹。達爾富爾危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聯大多次提出制裁蘇丹，但遭到中國的反對。

今天中石油成為蘇丹境內最大的外國投資商，在蘇丹國際石油財團中擁有41%的股份，已鋪設了1506公里的大口徑石油管道，並與蘇丹政府合資建立了250萬噸年加工能力的喀土穆煉油廠。中石油的開發，讓蘇丹從一個石油純進口國一躍成為石油出口國，石油出口成為蘇丹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數年來，中石油在當地無償援助建設醫院、學校等公益事業，累積投入達2000萬美元，但對達爾富爾人道主義危機沒有進行有效干預。出於現實考量，中國難以站在西方國家同一陣線向蘇丹施壓，因為實施制裁就必須撤離正在投產的油田。

中國政府在蘇丹面臨的困境在於：其一，如果中方繼續堅持只與北部的蘇丹政府打交道，漠視蘇丹南部的政治動亂，就會存在到2011年前後中資石油企業被迫從蘇丹撤出的風險。中石油的開採地處在蘇丹南部以穆格萊德為中心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宗教和政界人士對中國與蘇丹的石油合作項目頗有微詞²。根據2005年1月9日蘇丹南北雙方達成的協定規定，內戰正式停火後，蘇丹將經歷為時6年的過渡期。過渡期結束後，蘇丹南部省份將就是否獨立舉行全民公決。屆時一旦蘇丹南部山河易主，中石油的開採合同和投資將面臨何種情形？如果屆時蘇丹南部走向獨立，而北部中央政府不予承認的話，蘇丹南部已經熄滅了的戰火必定重燃，將出現一個比達爾富爾更大的危機地區，中石油縱使堅守不撤，但必然深陷戰火之中，又如何談發展？

其二，達爾富爾危機若持續惡化的另一後果是導致該問題的國際化，甚至可能引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行干涉。2007年2月胡錦濤主席訪問蘇丹等非洲國家期間，美國宣佈設立非洲司令

部。美國名義上打算通過設立非洲司令部打擊恐怖主義勢力，防止非洲大陸極端恐怖主義思潮的蔓延，但其戰略上的考慮並不止於此，那就是以反恐的名義完善其全球戰略部署，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就非洲而言，則是利用其「硬實力」維護其在非洲的能源安全。根據美國政府有關資料顯示，2006年美國從非洲的石油進口量已超過了中東，達到223萬桶。此外，非洲石油在美國市場所佔比例也已達到22%，為過去二十五年之最。有預測說，未來十年內美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將會增加到25%左右³。

同為非洲內戰，如剛果（金）內戰造成了200萬至470萬人喪生，卻不見美國關注。理由很簡單，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對美國等西方國家來說並不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蘇丹則不同。隨著非洲在美國國家戰略中地位的上升，美國不可能長久對達爾富爾的動盪視而不見，這是介入非洲事務的一個「很好」機會。非洲司令部建立之初，美方就規定職責之一是「先發制人地減少衝突」。就在蘇丹已經答應聯合國部隊進入後，美國卻在2007年6月1日仍宣佈制裁蘇丹，這是一個不太尋常的信號。從局部看，蘇丹問題國際化的後果將損害中國的海外石油戰略和經濟安全。中國在蘇丹擁有目前海外最大規模的石油投資，這些投資不僅對中國開發蘇丹的石油資源必不可少，而且是將來開發整個非洲石油的立足點；更深遠而論，它將是威脅中國海外利益的一個糟糕先例，從而撕開中國海外利益的缺口。此惡例一開，今後中國對自己的投資區域或者任何一個經營已久的地區，都可能因壓制不住的「內政問題」，最終演變成國際問題而逐漸喪失控制。所以，諸如蘇丹國內穩定之類的內政問題不解決，中國就無法同非洲長期合作，也就是說，中國在非洲同西方競爭中就很可能很快敗下陣來。那時，中國的任何無私援助的宣示就會站不住腳，而中國自己就有可能被擠出非洲。

其三，達爾富爾危機國際化的另一個體現是，它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並進而損害中國的整體國家戰略，這尤其表現在該問題牽扯到2008年奧運會。從2005年起，國際社會就湧動著一股抵制2008北京奧運會的潮流，原因是歐美輿論抨擊中國在非洲採取所謂不干涉、不附加條件的態度是罔顧國際正義。西方認為，在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災難問題上，中國沒有向蘇丹施加足夠的壓力，迫使其走上聯合國決議的軌道。在表決1706號決議時，中國不贊成聯合國維和部隊的進入，已經讓中國背上為了一己石油之私利，不惜縱容暴力之惡名。米婭·法羅（美國影星）、斯皮爾伯格（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和閉幕式藝術顧問）等西方精英人物的言論儘管我們不喜歡，卻無法否認其巨大煽動性。畢竟，當今世界的政治秩序的主導者依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以中國目前的實力尚無法對這些聲音充耳不聞。

2007年之前，中國堅持對蘇丹內政「不干涉」的立場，一直提倡政治解決，反對制裁蘇丹，甚至因1706號決議投棄權票而遭國際詬病，表現了明顯善意，但中方的善意表達是否會得到善意回報呢？這是任何人也不敢斷言的，因為殷鑒在前。2002年10月，加拿大塔利斯曼公司擬出售其在大尼祿石油作業有限責任公司（GNPOC——中國、加拿大、馬來西亞、蘇丹四方聯合體）所持的25%股份，中石油希望購進，但遭到了蘇丹政府的反對，最終中石油競購失敗，塔利斯曼25%的股份最後落入印度石油公司之手⁴。由此不難看出，在這一過程中，蘇丹政府希望用印度平衡中國的影響，中石油的市場主導地位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過去如此，未來中方也沒有理由指望蘇丹政府或其他非洲國家會因為中國反對在聯合國機制下實施制裁，而回報中國在其境內資源開發的特殊利益。

世易時移，中國的非洲戰略也應與時俱進。時代要求重新評估「無附加」原則，突破傳統的外交思維，不拘一格地開闢新的外交戰略。在戰略層次上堅持「不干涉內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同時，戰術上則以變應變。在適當條件下，積極研究、參與所在國事務，推

動非洲國家政治邁向穩定、和諧。惟其如此，才能切實保護中國的非洲利益和發展戰略。令人欣慰的是，中國已開始在非洲內政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了。2007年2月，胡錦濤主席在訪問蘇丹時與蘇丹總統巴希爾會晤，提出了中國處理達爾富爾問題的四項原則，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定認可。這是繼2006年11月中非北京論壇上，胡錦濤主席與巴希爾總統會晤之後的第二次會見。4月，蘇丹政府同意讓國際維和部隊進駐，以阻止達爾富爾地區的暴力衝突。有分析稱，這是因為中國發揮了重要影響，蘇丹方面才原則上接受了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的和平方案，就在該月，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第二次訪問了蘇丹，並前往達爾富爾地區實地考察了當地形勢。

2007年5月，中國政府任命劉貴今為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近期主要工作將重點圍繞達爾富爾問題展開。中國還向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派遣了275人組成的工兵分隊，參與執行聯合國安南方案第二階段計劃。安南方案第二階段計劃旨在由聯合國向非盟在達爾富爾地區的維和行動提供支持。中國此舉必將有效緩和達爾富爾的人道主義危機。蘇丹政府已經改變此前堅決反對聯合國進駐蘇丹的態度，同意派遣3000名聯合國維和士兵。中國的努力在國際上也贏得了喝彩。美國總統任命的蘇丹事務特使納齊奧斯稱讚中國發揮了「積極作用」，指出中國的「含蓄外交」是對制裁政策的重要補充。英國外相貝克特認為「中國政府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⁵ 2007年6月1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高度讚揚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所發揮的有益作用，並反對將達爾富爾問題與北京奧運會掛鉤⁶。中國對非洲政策的調整，是作為新興大國外交成熟、責任感增強、對自己戰略利益更善於保護的一種進步表現。

二 干預策略討論

中國非洲政策的調整可以考慮從以下角度展開：

首先，調整對非交往只限於同合法政府打交道的傳統，開闢高層交往之外的其他管道，積極與非洲國家不同利益派別接觸。通過深入了解非洲社會矛盾的內部肌理，採取建設性態度，靈活穩健地參與非洲內部事務。近年來中非之間的首腦外交十分活躍，但因為非洲特殊的形勢使然，中國企業目前遇到的挑戰主要來自非政府層面。尤其是發生動亂的熱點地區，通常都是「非常態」甚至「嚴重非常態」的無政府狀態，局勢十分動盪。在這樣的地區，政府權威幾近於無，一些非政府利益集團，諸如分裂主義分子和反叛武裝分子，雖然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但它們對地區局勢發揮著重要影響，有的甚至扮演了類政府的主導角色。另外，非洲的人權活動分子、反對黨以及其他政治勢力等也對中國形成了挑戰。例如，非洲的工會組織大多十分激進，有些工會雖然只由幾個人組成，但能量卻不小，且喜歡「為民請願」，常常把政府搞得很狼狽。有鑒於此，「只同合法政府打交道」已無法解患紓禍。對於能夠掀起風浪的利益集團或者部族勢力理應認真對待，積極接觸，而不加絲毫干涉只會養癰成患，釀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和地區危機。

其次，既然我們無法拒絕干預，就更須講究干預的策略和技巧。很多情況下，干預本身是一個中性概念，干預得當，將威信倍增；干預失策，就會自取其辱，因此背上沉重負擔，承擔嚴重後果。現階段而言，假非盟等國際組織之手，實施干預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式。非洲社會經過殖民化和西化的演進，為人道主義干預提供了天然條件。近年來非洲政治民主化進程較快，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等發展很快。無論在政府檔，還是在老百姓的日常交談中，民主、人權這些詞語經常出現。非洲早在1988年就成立了全非洲「人權委員會」，旨在推進非洲人權事業的發展。「互查機制」、「非漠視原則」等認同跨國干涉的理念已經深入非洲人

心。約有近一半非洲國家加入的「非洲互查機制」，要求加入國必須將其政府管理、經濟政策，以及人權等方面的情況公開，接受其他成員國按照既定標準進行檢查和評估。如果成員國出現諸如「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反人類罪以及對合法秩序的嚴重威脅」等事件，《非盟憲章》中的「非漠視原則」規定，「非洲聯盟和平與安全理事會」可對有關國家進行軍事干預，也可在成員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時派出維和部隊，制止戰爭，維護和平。

非洲國家對國際干預、「主權至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與我們的立場有所不同。甚至一些非洲人對中國的民主和人權狀況反而有些不理解⁷。可見，非洲大多數國家不管是思維方式上還是具體執行中，都對「干預」持相當程度的認可。非洲不少國家雖然徘徊於專制與民主之間，但總體來看，當前非洲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認同，遠遠超過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認同，非洲大陸更靠近民主⁸。即使在一些高度集權的國家，公民社會業已相當強大，民主思想在百姓中有相當深遠的影響力，政府對社會、對言論的控制很難達到東方儒家國度的程度。非洲國家的這種傳統，就為中國依靠「非盟」等國際組織來抑制動亂地區事態惡化、穩定秩序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強大資源。

第三，加強與西方國家的協調，東西方「齊抓共管」。現今的國際秩序雖然由西方主導，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大增，中國成為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獲益者，現階段也應該擔負起現今國際秩序維護者的一部分責任。鑒於這一變化，中國同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利益有很大程度的趨同。美國前副國務卿、現任紐約高盛投資公司副總裁佐利克提出，今天美中在非洲有共同的利益。從長遠角度講，非洲的穩定發展不但有利於中國，歐美也是受益者。美國國務院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萊恩伯格2005年7月28日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非洲事務小組委員會上表示，基於我們對全球石油市場的共同依賴和對中東以外的多樣化資源的共同追求，中國在非洲會有許多與美國相同的利益。中國在非洲影響的日益增長可以作為建立更廣泛的建設性雙邊關係的一項內容⁹。中國可以跟歐美國家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勸誘非洲國家的政府加大力度進行國內政治改革，提高政治穩定度，以有效防控各種安全風險。

同樣是干預，因干預的主體不同，干預的結果也會因「國」而異。中國的出發點不同於西方，加之半個世紀培育起來的友好關係，只要策略方法得當，中國的干預是可以做到春風化雨，為廣大的非洲國家所接受的。事實上，中非交往並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至少中國的設限——與大陸交往者不得同台灣保持任何官方聯繫，就得到了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的認可。現在中國提出的通過解決貧困問題作為緩和與化解非洲動盪的切入點，可謂把准了非洲的脈搏。非洲的問題雖然最終需要非洲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才能臻於至善，但在種族、部族等矛盾不能短時間化解的今天，將貧困問題作為突破口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應急藥方。

過去，西方國家改革非洲的方式是意識形態掛帥，把突破點和重點放在推行大規模激進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所謂「華盛頓共識」），而很少顧及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這種模式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它在非洲社會安全網建立之前就實行自由化；在社會管理制度形成之前就實現私有化；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最後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對大多數非洲國家來說，他們的頭等任務是消除貧困，貧困是造成衝突和各種形式極端主義的直接根源。他們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而是一個能夠消除貧困，提供基本服務和安全的政府。

上述所論是在戰術層面上的調整，但現階段在戰略層面和輿論宣傳上理應繼續堅持「不干

涉」與「無附加」原則（這是中國在非洲致勝的法寶）。中國對非政策既應有所「變」，亦應有所「不變」。中國派出的工兵不參加軍事行動，可視之為中國「不干涉」政策的堅持。中非作為戰略夥伴關係，開展的是全方位的合作，這自然就創造了大量雙方互相接觸和影響的機會，親其人方信其道，中國完全可以發揮西方國家和日韓印等國無法企及的影響，引導非洲國家走向穩定和發展。

三 關於外交思維的轉換

中國非洲戰略調整的意義不會僅限於非洲。中國目前與世界關係所處的階段，與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代極為相似。當時的美國社會在完成工業化之後，國力日漸提升，在國際關係領域已經無法稍居一隅，如何確定本國與世界的關係，成為美國外交急需解決的問題¹⁰。政治精英們經過辯論與實踐，選擇了國際主義作為外交哲學的指南，逐步淡化孤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外交哲學中的國際主義不同於上世紀60、70年代中國支援亞非拉革命運動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屬於「革命外交」），是指圍繞國家利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開展廣泛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活動。當前，中國外交指導思想從60、70年代的「鬥爭哲學」轉變為強調「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的理想主義¹¹。外交活動中打出的「和諧世界」旗幟在化解「中國威脅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消極作用也日益凸現，對「互利共贏」、「平等互信」的過分強調導致中國在國際問題，尤其是非洲問題上屢屢被動，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聲望受到極大損害。經過西方國家輿論的鼓蕩，主張不干涉非洲國家內政的中國，已被刻畫成了一個只顧賺錢、罔顧國際正義的國家。而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出現了質疑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的聲音。對非外交中美好理想的實踐沒有結出中方希望的果實。

此外，中國外交理想主義哲學還有另一種表現形態——「天朝大國」式外交思維。這種思維源於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文明積累，古代中國以大國自居、以恩賞小國來體現天朝氣派，那種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美好回憶潛化為中國外交文化的基因，流弊至深。它實際上是將中國的人際關係原則泛用於國際關係，不符合現代政治學邏輯。在中國外交戰略大調整的時代，確有必要予以深刻反思。對外援助，包括對非援助只能是中國非洲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或者說一種途徑、步驟。認為付出援助別人會因此感激不盡，以及冀圖以無條件援助來建立牢固同盟，只能是一廂情願，「鮮血凝成的友誼」尚且不可靠，何況是金錢援助呢？只有將援助置於中國非洲整體戰略考慮中，賦予商業互惠精神和國際貿易內涵，中非關係才能因援助而得到鞏固和加深。

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必然要歸位於「理想主義 + 現實主義」。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都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混合體。縱觀各國的外交哲學，雖然各國幾乎都把自己國家的外交政策與一定的道義原則聯繫起來，以表明自己國家奉行的外交政策是高尚的，但最終都要在道義原則與國家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國家利益往往成為影響外交方向的重要乃至主要的因素。今天對非政策的調整，只不過是這種歷史性轉變的一個章節而已。在這個經濟政治化和政治經濟化的時代，中非之間的經貿合作不是單純經濟性質的經濟問題，任何經濟交往的背後，都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必須貫徹大外交的理念，統一國內企業界、政府部門、新聞機構、文教部門的行動，協調與國際社會以及非政府組織等部門的關係，以實現「組合式管理」。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對非政策調整的影響可能是深遠的。可以預期，這一種轉變僅僅是一個開始，而且決不會局限於達爾富爾一地、蘇丹一國、甚至非洲一隅，中國可能在更多熱點地

區、更多國際關注問題上展示出越來越主動、越來越自信的姿態。

事實上，從近年來中國在一系列國際熱點問題（朝鮮六方會談、伊朗核談判、中東問題）上較以往更活躍、更積極的作為，以及中方政要屢屢發出的願意承擔國際責任，成為負責任大國的聲音，都可看出新形勢下中國正開始審慎地重新思考自身外交戰略。近來中國多次表示，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有決心承擔更多應盡的國際義務。隨著非洲在中國戰略格局中重要性日益顯著，非洲各國的穩定、和平也越來越成為與中國戰略利益攸關的事件，創造、維護這種穩定、和平，也成為維護中國戰略利益的重要一環。中國對傳統外交政策和習慣做法的反思、修正，正是在新形勢下深思熟慮，所作出的應時之變。中國的轉變不是「被迫而為」，而主要是出於自身考慮的主動選擇；促成這一轉變的的確是利益，卻是遠比蘇丹石油安全更重大的利益考量¹²。伴隨著這一轉變，中國外交將走向專業和理性決策，向更加契合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現代外交發展。

註釋

- 1 資料來自聯合國中文網站，〈特派團：達爾富爾又發生數起攻擊事件〉，<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6532>
- 2 賀文萍：〈關於加強中非全方位合作的若干思考〉，《西亞非洲》，2006年第8期，頁23。
- 3 王震：〈豈能拿中國說事？〉，載<http://www.sass.org.cn/ggl.jsp?sortid=1199&artid=17335>，2007年4月24日。
- 4 Anonymous, "Talisman Marks End of Era with Completion of Sudan Sale", *Oil and Gas Journal* (7 April 2003): 36; 亢升：〈印度投資蘇丹石油業簡析〉，《西亞非洲》，2003年第6期，頁52。
- 5 〈蘇丹危機使中國陷入困境〉，星島環球網，http://www.singtaonet.com/ed_china/200705/t20070525_544029.html，2007年5月25日。
- 6 〈潘基文讚揚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發揮有益作用〉，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02/content_6188224.htm，2007年6月2日。
- 7 賀文萍：前引文，頁24。
- 8 陸庭恩：〈以新思路推動中非合作新發展〉，《瞭望新聞週刊》，2000年10月第42期，頁57。
- 9 《美國參考》刊文：中美在非洲共同利益多，《環球時報》，2005年8月3日第6版。
- 10 代兵：〈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國際主義的興起〉，《二十一世紀》，2007年2月號，頁89。
- 11 張睿壯：〈中國當代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二十一世紀》，2007年2月號，頁82。
- 12 陶短房：〈達爾富爾：讓步還是進步？〉，《縱橫週刊》，2007年第15期，頁10-11。

郭培清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六十六期（2007年9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